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主编 执笔 王弘振



安多藏蒙 医药学史研究

4-09

西藏人民出版社

评 介

对于安多藏蒙医药学史，过去很少有人探索研究，更少有人著书立说。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在广泛搜集翔实资料、确凿依据的基础上，潜心研究，认真著述，撰写了一部彰幽阐潜、系统全面的《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在国内领先一步，填补了藏蒙医药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可说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创新之作。

此书富有独到见解，诸如安多藏族先民卫生条件的改进与医药知识的萌芽与流传；安多北缘敦煌石窟出土藏族医药文献在藏族医药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的复兴对藏族医药学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甘肃省下西沟岘发现的党项羌医药文献与藏族医药学的关系及其意义；安多地区医明学院的兴起与发展及安多著名藏蒙医药学家的贡献与医著；新中国藏蒙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等。这些领域，罕见前人挥笔论述，付梓传世。

此书立意新颖，内涵丰富，章节分明，言简意赅，为读者奉献了一部可读可信、增长知识的安多藏蒙医药学史，可谓治学有功，难能可贵。

编审者 1994年10月于兰州

前 言

藏蒙医药学史是中国医药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研究藏蒙医药学史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课题。关心藏蒙医药学史的一些学者，相继写出了一些有关论著。不过目前的研究成果，因受地区、资料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比较零散、片面，未能写出一部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比较完整系统的藏蒙医药学史著作。特别是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史被许多学者忽视，在整体藏蒙医药学史中几乎是个空白。为填补这个空白，我们选定了《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这个课题。要完成这个课题，牵涉的问题较多，有较大的难度。经反复思考，我们觉得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解决好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安多藏蒙医学史是整体藏族医药学史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体系。这是由藏族自身的历史决定的。藏族是吐蕃王朝在扩张疆土的过程中征服其它种族或部落之后逐渐形成的一个古老民族。在形成前后，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并具有鲜明的多元性。简单地对待藏族历史是不科学的。藏族聚居的地区，起初是一个不确定的地域概念，它随着吐蕃王朝统治地域的不断扩张而逐渐演变。直至13世纪（元朝时期）才有了地域上的明确概念。藏族聚居地区，大抵分为三大地区，即卫藏地区（卫即前藏，藏即后藏）、康巴地区和安多地区。这三个大地区都是依据特有的自然条件和方言土语等因素确定

的，并不是随意划分的。安多是安卿岗日（玛沁雪山）和多拉让摩（祁连山）的简称。它虽指两山，但实际泛指巴颜喀拉山和祁连山及其附近的辽阔地区，即青海省（除玉树外）的全部藏族地区，甘肃省的甘南藏族地区和河西藏族地区以及四川省的阿坝藏族地区。这个地区的藏民操藏语安多方言。从历史角度看，安多是个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的地区，在藏族形成前后，安多地区的古老种族或部落向其他地区迁徙过，其他地区的种族或部落也向安多地区迁徙过。这里曾经是羌人、吐谷浑人、汉人、蒙古族人、清人、土人等生息、繁衍、劳动过的乐土；现在除汉族和藏族是这里的主体民族外，还有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东乡族、裕固族和保安族等。因此，研究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史，必然要涉及其他民族医药学史。

《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从主语词看，其研究范围理应限于安多地区，否则，课题本身就会失准。然而，安多地区的藏蒙医药学与卫藏地区、康巴地区和蒙古族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历史渊源考虑，安多地区医药学的萌芽早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就藏族医药学的形成和传播而言，卫藏地区则先于安多地区及其它地区。如果不记述卫藏地区藏族医药学的形成，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史就会断线，衔接不起来。如果不记述蒙古族向安多地区的迁徙及藏族医药学向蒙古族地区的传播，近代蒙医派的形成及安多地区蒙古族医药学家对形成近代蒙医派所作的贡献就难以记述清楚。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突出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史的同时，也适当记述了卫藏地区、康巴地区和蒙古族地区的医药学史。不过，从我们近三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对安多地区藏蒙医学史的个别阶段反映得不充分或没有作出反映。吐谷浑政权在安多地区存在 350 余年，在医药学上的成就不小，从零星资料看，吐谷

浑医师的医疗水平很高。吐蕃赞普达日宁塞的目盲症，就是吐谷浑医师阿夏用金针摘除翳障后治愈的。赤松德赞邀请的“九太医”中就有吐谷浑医师桑多俄青。但这样的记述太少了，难以反映吐谷浑医药学的成就。唃廝囉政权在安多地区存在约四分之三世纪。那时，正是藏传佛教后宏期刚开始的时期，而藏传佛教后宏期发端于安多地区，可是在有关唃廝囉政权的史料中，却没有唃廝囉政权时期的医药学史资料。诸如此类的缺陷，只能在挖掘出这方面的资料后再去弥补。

二、要解决好医学与佛教的关系问题。佛教传入藏族地区以前，藏族医药学与佛教的关系甚微，但在传入之后，不仅关系密切，而且佛教对藏族医药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一般来说，佛教寺院的僧侣都要学习大小“五明”（大“五明”是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小“五明”是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大“五明”中的医方明即是医学，内明即是佛学。较大的佛教寺院还附设曼巴扎仓（即医明学院），专门培养僧医。正因为如此，许多佛教僧侣懂得医学，许多专业医生信奉佛教。特别是一些著名高僧，佛医兼通，对藏族医药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有人却把佛教对医学的影响斥之为迷信，甚至拿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来压人。我们认为，对待马克思的话，不应断章取意，而应结合具体情况，有分析地予以运用。马克思的论断本来很全面。他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是这样说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神圣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当人们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压迫，而借助宗教去反抗压迫，以求得解

脱苦难时，它就有激人奋进的作用；当统治者利用它麻醉人们的反抗精神时，它就起着反动的作用。真理只要向前跨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是至理真言。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谁都知道，它的根本体系与其它宗教一样是唯心的，但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在一定条件下，它的一些观点是合理的，对社会经济、文化、医药都起过积极作用。细心人一定会注意到，1990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则分析泰国经济近年迅速发展的评论，认为原因之一是泰国90%以上的人信仰佛教，待人虔诚，团结合作，为泰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佛教本身有这样的积极作用，受佛教哲理指导的藏族医药学在医治人的疾病方面，则有亲眼可见的实际效果。比如密宗高僧毗卢遮那，其主要活动是翻译佛经，但也翻译医著，谙熟藏族医药学。因他传播密宗佛法，被信奉本教的王后蔡邦萨逼迫出走，来到嘉绒地区（即安多地区的阿坝一带）。嘉绒王多西尔拉波怀疑他与赤松德赞搞阴谋，便把他关进岩洞，先后放入青蛙、虱蚤、蚊虫，企图置他于死地。然而他的功法非凡，又具有“消除众生疾病的医学典籍之王”，各种虫毒却奈何他不得。当嘉绒王得悉他精通佛法，谙熟医学时，就请他出来传经行医。他的功德至今还被阿坝人民广为传颂。再如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其主要活动是佛事，同时又精通医学。他以教派领袖身份同成吉思汗之孙阔端。在凉州会晤时，治愈了阔端多年所患的头痛病。这曾被史学家传为佳话。又如当代著名藏医尕布藏原来是香扎寺活佛，曾获医学曼巴拉然巴和多然巴格西学位，现在是青海藏医学院名誉院长、藏医主任医师。他具有较深的医学理论，又勤于著书立说，在藏医界有颇高声望。他与其他著名藏医合作研制的珍珠70味、常觉160味、芒角35味、早智达西550味和西蒙尼顿对医治一些疑难

病症均获显著疗效。著名藏医旦巴嘉措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又是成绩卓著的藏族医药学家。他在甘南行医数十年，谙熟医学理论，富有临床经验。他研究和鉴定的100多种藏药单方和单味药品已编入《藏药标准》，其中洁白丸、九味沉香散和九味中黄散已被列入国家药典，为藏族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研究藏族医药学的过程中，比较充分地记述了佛教对藏族医药学的影响，介绍了一些著名高僧对医学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的生平及其著作。这样，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藏族医药学的面貌。

三、要解决好医史与通史的关系问题。医药学史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因此，研究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史，自然要着眼于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史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不论一般医药学史还是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史都不是孤立地发生、发展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它寓于普通史之中，并受其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一般医药学史或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史应与一定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我们在设计《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的课题时，由于没有同普通史联系起来，就觉得有些问题弄不清楚。比如离开普通史，把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史与卫藏地区藏族医药学史生硬地联系，就联不上，似乎要断线。后来，在研究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史的过程中，有的学者建议将它置于一定历史背景下，有些问题就容易搞清楚。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在研究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时，首先考虑普通史各个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然后研究藏族医药学史各个阶段的状况，问题就清楚得多了，好解决得多了。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撰写《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时，就把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史划分成五个阶段，安排了五个章节，即藏族医

药学的历史渊源、藏族医药学的基本形成、藏蒙医药学的逐步发展、藏蒙医药学的广泛发展和藏蒙医药学的蓬勃发展；每章安排一节或一目，首先记述中原地区和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然后安排数节或数目详细记述藏族地区的医药状况，著名医药学者及其医药学著作等。作了这样的安排，撰写起来很顺当，比较好地弄清了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发展的来龙去脉。不过，存在的问题是安排一节或一目记述某个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会给人一种喧宾夺主的感觉。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虑。

四、要解决好编年与记事、专论的关系问题。研究和撰写《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时，我们主要采取了编年与记事结合的方式，记述每一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和医药的发展状况时，以编年为主，记事为辅，其意图是要分清藏蒙医药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所达到的水平。记述每一历史阶段医药学家的生平、业绩及其医药学著作时，以记事为主，编年为辅，其意图是要反映藏蒙医药学发展的具体内容和成果，并作出适当的评价。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问题在于有些记述或评价由于过细或过长，就显得有些画蛇添足。比如藏族先民医药知识的源流、藏医和汉医脉诊的比较、益希班觉尔的族属考，都太细太专，特别是藏族先民医药知识的源流，从远古记述到现在，大大突破了时间界限，问题比较突出。对这个问题，我们作了这样的考虑：《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不是定论性的而是研究性的，讲得细一些、专一些，是符合研究性质的，所以我们不嫌其细，也不嫌其专，给予它以较大篇幅。如果失之得当，今后研究时可以讲得简一些、粗一些。反之，有些医学著作的介绍和评价由于我们没有看到原著，显得有些不够详尽；医学家的生卒年代和事迹，由于缺乏资料，也介绍得过于简单，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今后应当在这方面再做些努

力。

我们在研究、撰写《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少，前面只讲了几个主要问题。这几个问题我们觉得应当解决好，但由于知识不足，水平有限，所以想解决好而又没有解决好。我们自己的估计是，这个课题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尽管存在问题，离长远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但填补空白的近期目标已经达到。现在走了第一步。今后还要走第二步、第三步、或更多的步。我们乐于和热心于安多地区藏蒙医药学史研究的同行携手前进。

目 录

第一章 藏族医药学的历史渊源	(1)
第一节 原始时代藏族先民的卫生条件和医药知识	(1)
一、藏族先民的原始生活状况	(1)
二、藏族先民卫生条件的改进	(5)
三、藏族先民医药知识的萌芽与流传	(8)
第二节 藏族先民的医学成就及与外界的医学交流 ...	(23)
一、羌人被吐谷浑人的征服与专业医生的出现	(24)
二、吐蕃王朝前的社会制度及宗教信仰和医药 状况	(26)
三、吐蕃医学与外界医学的交流	(30)
第二章 藏族医药学的初步形成	(32)
第一节 吐蕃王朝兴盛时期的医药学成就及《四 部医典》的问世	(32)
一、吐蕃王朝的建立及其扩疆拓土的结果	(32)
二、唐蕃联姻与汉族医学输入吐蕃	(35)
三、吐蕃王朝兴盛时期发展医药事业和培养医 药人才的成就	(39)
四、宇妥·元丹贡布所著《四部医典》及其划 时代意义	(44)
五、安多北缘敦煌石窟出土的藏族医药文献	(53)
第二节 吐蕃分裂割据时期藏族医药学的曲折发展 ...	(57)
一、吐蕃王朝的分裂及对藏族医药事业的影响	(57)

二、藏传佛教复兴时期藏族医药学的复苏与发展	··· (59)
三、武威出土的西夏党项羌医药文献及其意义	····· (66)
第三章 藏蒙医药学的逐步发展	····· (71)
第一节 元朝时期的藏族医药学	····· (71)
一、元朝对藏族地区的政策及其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 (71)
二、元朝时期藏族医药学的发展	····· (74)
第二节 明朝时期的藏族医药学	····· (82)
一、明朝对藏族地区的政策及其影响	····· (82)
二、明朝时期藏族医药学的发展	····· (85)
第三节 远古至元明时期的蒙古族医药学	····· (93)
一、蒙古族的兴起及其进入青藏高原的原委	····· (93)
二、蒙古族医药学的萌芽与形成	····· (98)
第四章 藏蒙医药学的广泛发展	····· (104)
第一节 清朝时期的藏族医药学	····· (104)
一、清朝对藏族地区的政策及其影响	····· (104)
二、西藏地区藏族医药学的发展	····· (110)
三、康巴地区藏族医药学的发展	····· (116)
四、安多地区藏族医药学的发展	····· (119)
第二节 民国时期藏族医药学的状况	····· (153)
一、民国政府对藏族地区的政策及其影响	····· (153)
二、民国时期的藏族医药学	····· (155)
三、民国时期的藏族医药学家及其医药学论著	····· (159)
第三节 清朝至当代蒙古族医药学的发展	····· (165)
一、蒙古族医药学体系的形成	····· (165)
二、清朝至当代的蒙古族著名医药学家及其医	

药学著作	(167)
第五章 藏蒙医药学的蓬勃发展	(179)
第一节 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医药事业 的重大变化	(179)
第二节 藏蒙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	(182)
一、西藏的藏族医药事业	(182)
二、青海的藏蒙医药事业	(184)
三、甘肃省甘南州的藏族医药事业	(192)
四、四川省甘孜、阿坝两州的藏族医药事业	(194)
第三节 当代部分著名藏蒙医药学家及其医药学 著作	(196)
一、西藏的藏族医药学家及其医药学论著	(196)
二、青海的藏蒙医药学家及其医药学论著	(198)
三、甘肃的藏族医药学家及其医药学论著	(204)
后 记	(217)

第一章

藏族医药学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原始时代藏族先民的 卫生条件和医药知识

一、藏族先民的原始生活状况

早在万年以前，原始时代的一些不相统属的部落，即藏族先民就生息、繁衍、劳动在青藏高原的辽阔地域。这已被后来发掘的许多文化遗址所证明。截至目前，甘肃发掘的有关文化遗址有：山丹县龙首山文化遗址、民乐县东灰山文化遗址、临洮县马家窑文化遗址、广河县齐家坪文化遗址、临洮县辛店文化遗址、临洮县寺洼文化遗址、民勤县沙井文化遗址等；青海发掘的有关文化遗址有：柴达木小柴旦文化遗址、玉树文化遗址、马家窑马厂、半山文化遗址、乐都县柳湾文化遗址、齐家文化遗址、湟中县李家山卡约文化遗址、孙家寨文化遗址、青海湖畔黑马河文化遗址、贵德县罗汉堂文化遗址等；西藏发掘的有关文化遗址有：定日县苏热和霍尔区文化遗址、林芝县（1958年、1959年、1974年、1975年陆续发掘）文化遗址、聂拉木县文化遗址、墨脱县（1973年、1977年先后发掘）马危翁文化遗址、昌都卡若村文化遗址等。这

些已被发掘的文化遗址中，遍布于安多地区的文化遗址以卡约文化为代表，遍布于卫藏康巴地区的文化遗址以卡若文化为代表，而玉树曲麻莱文化遗址则是卡约文化和卡若文化的交会点。这些文化遗址表明，在远古时代，青藏高原是一个不相统属的部族社会。直至吐蕃王朝统一各地区的部族之后，才形成了现代的藏族共同体。显而易见，藏族共同体具有不可否认的多元性。但应肯定，安多地区的藏族先民，即羌人是现代藏族的主要族源之一，而且历史悠久，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首先，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羌人的历史渊源很悠久，文化层次较先进。青海柴达木盆地小柴旦的文化遗址距今约3万年，青海玉树柯柯西里和托托河谷沿岸的文化遗址距今1万余年，青海湖畔黑马河文化遗址距今约1万年，青海马家窑文化遗址距今6千余年，甘肃山丹县龙首山文化遗址距今5千年，甘肃民乐县东灰山文化遗址距今5千年左右，青海乐都县柳湾文化遗址距今4千年左右，青海湟中县李家山卡约村文化遗址距今3千年，青海柴达木盆地塔里塔哈文化遗址距今3千多年。约有3万年历史的柴达木盆地先民已会制作刮削器、雕刻器、砍斫器和钻具等，表明他们已能从事手工业生产。有1万年历史的玉树柯柯西里和托托河谷沿岸的先民，除采集和狩猎外，还驯化、豢养动物，表明他们已能从事畜牧业生产。有6千年历史的马家窑先民已会制作多色彩陶器，其形式有碗、盘、罐、钵等，表明他们的手工业生产比较进步。约有5千年历史的东灰山先民已开始种植大麦、小麦、高粱、粟和稷，表明他们已能从事农业生产，成为祖国谷物起源中心之一。有5千多年历史的青海马家窑先民已会制作纹饰陶器，其形式有双耳盆、单耳杯等，其纹以螺、涡为主。其中舞蹈纹盘有5人组成的古代妇女手牵手地翩翩起舞，绘制了古羌妇

女的生动形象。有3千年历史的柴达木盆地塔里塔哈先民开始建造土木结构房屋，围栏豢养绵羊、牦牛、骆驼和骏马。他们的屋内陈设着色彩精美、形状别致的陶器，主人身着彩色毛织品缝制的衣服，腰系彩色毛线编织的带子，脚登皮革制作的鞋履。妇女佩带着用石、骨、牙、蛤蜊壳制作的装饰品，用石轮纺毛线，男人则用手捻毛线。这表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达到了较高层次。

其次，从历史传说和记载也可以看出，羌人的历史很悠久，文化较先进。有些史籍明确记载，羌人是我国最古老的部族之一，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炎帝姓姜，早有文字记载。《左传》说：“炎帝神农氏，姜姓之祖。”《水经注》说：“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国语·晋语四》也说：“昔少帝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国语》把姜人祖先与华夏祖先相提并论，认为羌人祖先始于炎帝；羌人与黄帝祖群同源而异流。共工氏姓姜也有文字记载。《山海经·海内经》说：“先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竝，节竝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这里没有明指共工氏姓姜，而东汉贾逵《周语》“注”中把共工氏的属姓讲得很明白：“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传说夏禹也是羌人的后裔。《史记·六国年表》和《盐铁论·国疾》都说：“禹出西羌”。《帝王世纪》也说：“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也。”在甲骨文中，男羌称羌，女羌称姜。周人以姓氏观念把羌人的祖先称为姜姓。故有“姜姓出于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之说。从周的先世起，就与羌人通婚。相传周先妣姜嫄，为姜羌部落之女，生了周始祖后稷。在周的政治生活中，周人长期起着支配作用。羌

人随着历史的演进，大部分融合于华夏族，少部分留居原地，史称“西羌”。

西羌部族与藏族先民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都是现代藏族的族源。《禹贡》记载：“制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礼记·王制》写道：“西方曰羌，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新唐书·吐蕃传》认为：“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鹈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这里所举“发羌”、“唐旄”等部，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即居住在青藏高原上，与藏族先民的一部分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不能简单地说羌人就是藏族的前身。“羌就是藏”的说法忽视了民族演化的历史辩证法。当然，仅仅以卫藏地区的古代部族作为土著，而把其他地区从古以来说藏语的诸部族只作为与藏族有关的部分，而不视作土著，似与事实不符。今天居住在安多地区的藏族，是在绵绵历史长河中逐渐演进和发展起来的，是吐蕃和居住在中国西部边陲的各民族先民共同斗争、兼并、融合与同化的结果。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地处江河源头的安多地区，素称“羌戎乐土”，是个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多民族聚居的西陲重地，也是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医药科技等方面相互交流、兼蓄互补、影响较大的枢纽地带。早在吐谷浑统治青海时期，安多地区就成为中西交通的要道。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把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入西域的道路称为“吐谷浑路”，认为此路“与西域文化、民族关系甚大”。（转引自《吐谷浑史入门》第8页）在吐蕃王朝时代，安多地区更是吐蕃政权的战略要地。吐蕃王朝曾一度把政治重心转移到青海一带，并专设节度使管辖。从

692—763年，吐蕃王朝先后在青海召开过约40次王臣会议。吐蕃使臣仲宗说，这是“因求资食”，汉文载说：“军粮马匹，半出其中”。他们把安多地区视为重要的粮草基地和税收来源。由此可见，安多地区自古就是一个重要地带。它对促进民族合作、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起过积极作用。吐蕃王朝后期，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同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相互混战24年（843—866年），其结果是“二千里间，寂无人烟，赤地殆尽”。吐蕃在青海一带的统治力量逐渐消失，双方军人便转变为民，成为安多藏人。11世纪初，吐蕃赞普欧孙的后裔唃廝囉被河湟地区地方政教割据势力尊为“赞普”。1015年，唃廝囉“立文法”，建立地方政权组织，采取依附宗教、对抗西夏的政策。唃廝囉政权鼎盛时期，管辖范围包括青海海南、海北、黄南、东部农业区及甘肃天水以西部分地区。其政权以藏族为主体，境内居民有吐蕃人、吐谷浑人、回人、党项人、汉人及西域商人。这些居民，多数被吐蕃族逐渐同化，变为后来的藏族。元朝至清朝，历代中央政权都采取了各自所需的措施，如清朝除设置理蕃院外，还先后派员到青海，划定地界，“因俗设官”、“以马为赋”，并设立了千百户制度。各朝代采取的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藏族地区手工业的振兴，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藏族医药事业的发展。

二、藏族先民卫生条件的改进

医药知识是人们在医治疾病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它的萌发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直接相连。早在远古时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先民们通过与自然界和猛兽的长期斗争，逐步萌发了星星点点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卫生常识。对此，可以结合文字记载和考古发掘作些简略的研究。